

## 中国的高增长能够持续吗？

理查德·库珀 (Richard N. Cooper)

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：依据确切的标准，有4-6亿人摆脱了贫困。在过去的三十年间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%，增幅达16倍。不仅使人口得以增长，而且还将中国人均收入提高了12倍。这让许多家庭的生活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选择空间，不仅对自己，更重要的是对子女。中国的变化确实不可思议；假如有人曾在1980年预测中国经济在2018年的情形，当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说他在做梦。但是，奇迹的确发生了。

这一始料未及的增长源自何处，能否持续？本章将分析七个经济增长的来源，并主张其中六个来源将会消失或大幅缩减。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增长率将显著下滑。虽然这会引发新闻关注，却不应被解读为政策失败。经济放缓是基于根本原因。某些政策当然可能失败，但增长速度放缓本身并不代表失败。

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，增长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供给（包括提高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）、更多资本，以及一个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(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) 的剩余项，即不包含资本及劳动力的所有其他要素。大多数研究发现，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资本累积，仅有10-20%是因为劳动力的增加，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。背后的原因何在？

我找到了七个原因，而且无疑还会发现更多理由。

第一个原因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有明显变化。中央政府逐渐从社会主义体制中常见的自上而下、中央计划经济模式，即由政府直接安排生产配额和广泛的定量供应，转向实行市场经济模式。这意味着市民和企业都能以价格为基础作出自己的消费和投资决定，而每个产品的价格又反过来受其需求和供应强烈影响。此外，国内的价格水平与世界经济也有着更紧密的联系。

第二个原因是整个国家从近乎封闭的状态转向融入世界经济。政府积极鼓励出口，一开始是通过提供税收和政策优惠的经济特区，后来更普遍地推广。相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，中国更鼓励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流入，部分是通过经济特区，部分也面向国内市场。外资进入中国初期，是以合资企业模式为主，后来也采取外商独资企业的形式。中国的最初目标是获取短缺的外汇，之后则希望以此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，包括市场营销与管理技巧。

第三个原因是借助人数量众多的海外侨胞，其中许多人拥有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，能充当长期孤立的中国大陆连接世界其他地方的桥梁。其他国家的华裔商人知道哪些产品和服务会畅销，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市场，而且熟悉成功开展对外贸易所需的市场渠道及其他技巧。中国经济特区在初期的许多投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同胞，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。

第四个原因是研究者所说的人口红利：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（15-64岁）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著提高，从1990年的66%上升至2012年的74%。如果这些劳动力能高效就业——事实也的确如此——就能加速整体经济增长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。另外，在出现严重人口老化问题之前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当然也是促成巨大“红利”的原因之一。

第五个原因是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至生产活动中。这是所有贫穷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，农业在初期占据重要地位，除了耕种与收成的时节外，生产率普遍很低。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工业（或服务业），使国民的人均生产量大幅提高。在1980年，中国有70%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，到2016年已降至30%以下。据一项重要研究估计，这场劳动力转移就能带来1.1-1.3个百分点的GDP年增长率。

第六个原因是（以国际标准来看）极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，在某些年份接近全国生产总值的一半。某些投资是来自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，但大多数是来自并非中央政府控制的新企业，如乡镇开办的企业。此后，随着北京当局推出的新法规生效，市场开始出现私人投资，包括某些外国人的投资。至2012年，全部投资中约有65%是私人投资，为快速增长的非农业劳动力提供了建筑和设备。另有许多投资为人数快速增长、且收入逐步提高的城市劳动力提供了更新更好的住屋。还有许多投资用来建造基础设施，有部分用来兴建满足城市需求的供水、排水、道路、照明和交通系统，而另一部分则用来建设港口、机场，以及连接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。

第七个原因是教育。在1950年代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作出战略性决策，为全国所有年轻人提供免费小学教育，让农民能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。该决策对中国意义重大，令更多年轻人在习惯遵守每天上学的规律、听从教师安排后，进入常规的工厂就业。到1980年代中期，公办义务教育延长至九年，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也大幅增加，到2016年，有大约30%的年轻人受过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，而在1980年代早期仅有2%。

上述主要因素促成了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。当然，主要从学习外国而来的技术进步也发挥了关键作用。然而，新技术有大部分是通过以上提到的多个因素引进中

国的：外来投资（与建议）、海外侨胞的贡献、高投资率，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（包括外国企业带来的培训）。

那么，前景如何？这七个因素能否继续发挥重要作用？如果不能，是否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？不幸的是，除教育以外，以上多个因素的作用或许都难以持续下去。下面我们将逐一讨论。

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，转向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。然而，还有些例外，尤其是银行、石油和电信等行业，仍有改进的余地。但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，资源配置规则的进一步调整——即深化经济改革——可能会比1980-1990年代小得多。

外商直接投资仍在以仅次于进入美国的速度进入中国，带来了一些现代技术，并继续产生类似于过去的促进作用。然而另一项全球化指标——对外贸易——在将来的作用肯定会更加有限。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在198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三十年间维持了惊人的17%年增长率，使中国从全球舞台上默默无闻的角色变成最大的出口国。因此，未来的出口增长不能再成为主要推动力，贸易收益将或多或少与世界经济增长相约——以美元计算或许是每年5%-7%（包含通胀因素）。海外华人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，但也不再是主要增长来源。本土的中国人如今已基本学会了如何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。这方面的调整是个一次性的追赶过程，目前已完成了使命。

人口红利已经在2012年结束，即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顶峰。如今该比例预计会持续呈下降趋势，起初较为缓慢，到下个十年会加速，并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化回落到65%左右。由于人口政策已调整为“两孩”，出生率可能回升，但人口老化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。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预计将从2010年35岁提高到2040年的47岁，其惊人的增长速度只是仅次于韩国。尽管有政策调整，中国的出生率会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，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。

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已下降至不足30%，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依然在较高水平。因此，劳动力转移可以继续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。可是，最具流动性的农民工已经转移出来，而农村成年人的平均年龄在迅速增长。另外，土地承包和城乡户口政策妨碍农民完全放弃耕地，因为如果他们离开农村，承包地就可能会重新分配给他人。所以，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将会比以往要慢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减少。另外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并将继续上升，因此会削弱劳动力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收益。

中国政府近期明确提出的政策是实现经济再平衡，从依赖出口和投资，转向多依赖私人 and 公共消费，也就是建立消费者社会。此外，新投资的回报率在过去的十年有所下降，特别是公共投资（基础设施）和缓慢的国营企业投资方面。这意味着即使出现大规模的新投资，也不能像以往一样带来如此庞大的经济增长。因此，从投资率（相对于GDP）和回报率下降这两方面来看，都表明投资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以前弱。

因此，与改革后初期相比，这六个因素对未来增长的作用都会下降。这些都是根本变化，不太受政策影响，所以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下降不应该被称作失败。只有第七个因素“教育”，有可能发挥跟过去相当的促进作用，前提是教育体系继续快速扩展——前提是毕业生们能找到好工作。

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些因素减弱的影响，并提出年增长率为约7%的“新常态”，明显低于不久之前的9-10%水平。这一措施也在试图把公众期望拉回更接近现实的水平。因此，“十三五规划”（2016-2020年）所预计的年均增长率为6.5%。中国政府还强调把创新视为未来增长的主要来源的重要性，当然目前要判断其成效还为时过早。中国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死记硬背，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这不利于鼓励广泛的创新。中国的技术应用水平在许多领域上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，所以还可以通过引进更多外国技术获得收益。但类似过程已经延续了

三十五年，故我们无法保证中国能够提高对外国技术的消化和吸收速度，并加快国内的创新。

假如不能做到这些，那么即使在没有重大政策失误的情况下，中国在下个十年的整体增长率也将会低于既定的6.5%目标，在十年之后或许会降到5%以下。虽然这样的降幅可能会引发媒体的热议，却并不表示根本的失败。无论中国人，还是外国人，都需要认清这点。